

谁被“剩”下了？

——对我国“大龄未婚”问题的再思考

刘 爽 蔡圣晗

摘要: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本文发现,我国的“大龄未婚”人口虽然规模庞大,但占同龄人的比重很低;群体内部男多女少、农村地区相差悬殊;城市更多的是低龄“大龄未婚”者,而农村则以中高龄为主;在“大龄未婚”者的婚配选择中,城市“大女”择偶难,农村“大男”剩余多。“大龄未婚”问题的本质,不是因为总人口分年龄性别比不平衡,而是“女高男低”、“甲女”与“丁男”个人条件优劣不同的结构性失衡所致。近年来,伴随着“大龄未婚”人口规模递增和占同龄人比重的上升,两性的数量不平衡趋缓;对绝大多数“大龄未婚”者来说,这只是他们整个生命周期中的一种暂时性生存状态,最终大都会迈入婚姻殿堂,终身不婚者男性不到4%,女性不到1%。

关键词:大龄未婚 婚姻挤压 城乡差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出生性别比持续攀高、严重失衡的现象,受到政府、学界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其中备受瞩目并形成共识的是,这一失衡可能导致出现“婚姻挤压”的社会后果。在我国,这是以男多女少、部分男性难以找到结婚对象为特征的婚姻市场失衡。但我们也注意到,在人们忧虑未来可能有数以千万计的“光棍”的同时,也不乏对大龄“剩女”、尤其是城市优质“剩女”的讨论和担忧。而后者实际上已经超出出生性别比失衡后果的范围。由此我们有必要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了解和认识现代社会的“大龄未婚”问题。

实际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开始陆续有学者关注到“大龄未婚”现象,并开展了不同视角的分析。除了早期对“大龄未婚”人口群体特征及其成因(李咏华,1986:43-45;张萍,1989:53-58;罗萍,1990:36-38;叶文振,1998:16-22;刘爽、郭志刚,1999:14-20)的分析外,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两条重要的研究脉络得到突显:一是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分析,包括对其自身生活质量、居住与养老、“光棍”聚集与社会稳定、社区公共安全以及通婚圈变动等越来越广泛的讨论(姜全保等,2009:62-70;王跃生,2012:129-136;刘中一,2005:17-22;靳小怡等,2012:36-44;王磊,2013:55-61);二就是近几年日渐增多的对“大龄未婚”女性择偶难的探析。而这些研究基本都以“剩女”来冠之,并聚焦于她们“剩下”的原因及思考(王昌逢,2010:46-47;杨艳涛,2011:69-71;左雪松,2012:63-68;孟祥远、沈佳,2012:73-74);当然,对此也有学者反驳,认为“剩女”是“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陈友华、吕程,2011:42-48)。

虽然相关研究成果能帮助我们加深对“大龄未婚”现象的了解和认识,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大龄未婚”问题走向如何?有无变化?对男女两性是否有着同样的意义?其背后又折射出哪些重要的社会现象?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主要利用最新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数据,并结合1990年和2000年的“四普”及“五普”数据,从多个侧面展开对“大龄未婚”人口群体特征、动态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谁属于大龄未婚

结婚成家是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生命事件,绝大多数年轻人都会在社会普遍认可的年龄结婚成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的巨大变化,年轻一代的生活观念、包括择偶标准都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但是普婚、相对早婚的特点依旧继续存在。

2010 年的“六普”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在相对平稳中缓慢上升,从 1980 年的 23.78 岁上升到 2010 年的 24.85 岁,30 年间人口初婚平均推迟了约 1 岁;其中男性初婚推迟的程度比女性更大。由此反映出两点:一是尽管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变迁剧烈,但是人口的初婚形态及其变化相对平稳;二是虽然按照我国的相关政策规定,女性 23 岁、男性 25 岁为晚婚,^①2010 年男女分别有 49.4% 和 52.4% 达到或超过了晚婚年龄才初婚,但与一些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初婚年龄相比,我国人口在整体上依旧算是相对早婚的。

表 1 三个普查年份我国人口的初婚指标

初婚指标	1990 年			2000 年			2010 年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25 岁人口已婚比例(%)	82.42	74.02	91.29	68.49	56.80	80.17	55.12	45.85	64.17
30 岁人口已婚比例(%)	94.07	90.41	98.05	90.72	86.87	94.64	84.79	80.04	89.54
35 岁人口已婚比例(%)	95.29	92.26	98.56	92.87	90.99	94.81	92.10	89.29	94.98
40 岁人口已婚比例(%)	94.86	92.21	97.78	91.93	90.65	93.26	93.78	91.95	95.64
25% 人口已初婚年龄(岁)	20	21	20	21	22	20	21	22	21
50% 人口已初婚年龄(岁)	22	22	21	23	24	22	23	24	23
75% 人口已初婚年龄(岁)	24	25	23	25	26	24	26	27	25
男女初婚人数逆转年龄	22			24			25		

资料来源:(1)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1993,《中国 1990 年人口普查资料(100% 机器汇总)》,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2002,《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2,《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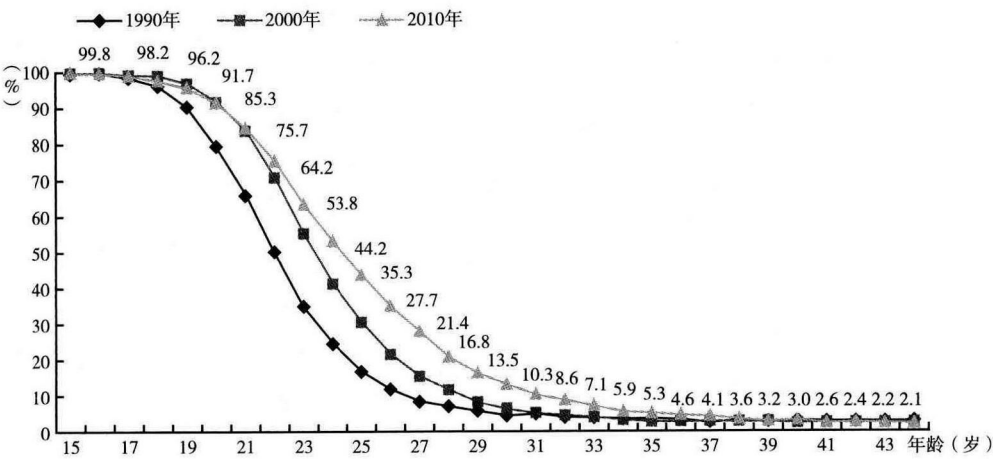


图 1 1990 年、2000 年、2010 年三次人口普查中国 15-44 岁人口分年龄未婚比例

资料来源:同表 1。

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到:(1)我国年轻人口的高峰结婚年龄段是在 20-29 岁。2010 年人口未婚比例迅速从 20 岁的 91.7% 跌落到 29 岁的 16.8%;30 岁以后虽然仍不断有人迈入结婚队列,但无论是人数还是速度,都明显减少和放慢。(2)1990 年到 2010 年的 20 年间,尽管年轻人口的初婚整体推迟,但是结婚模式未发生大的变化。(3)从 1990 年和 2000 年 25 岁、30 岁、35 岁及 40 岁等

^① 我国的《婚姻法》没有晚婚的条文,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鼓励晚婚晚育,即女性满 23 周岁、男性满 25 周岁为晚婚。但这不是强制性的,只是提倡性的。

节点年龄人口的已婚数据可以看到,我国30岁的人口已有超过九成的人迈入已婚者队列,35岁以后仍未婚者更是极少数;2010年人口晚婚的情况增多,但到30岁时男性也已有过八成,女性已接近九成是已婚者了。(4)从人口初婚的四分位数指标看,各个四分位数对应的年龄随时间的变化并不大,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大部分年轻人结婚还是相对较早,一般会在30岁之前解决“终身大事”。

鉴于上述我国人口的初婚年龄特点,我们将30-44岁设为“大龄未婚”人口的年龄范围。依据主要有三:一是我国年轻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在30岁以前迈入婚姻殿堂,只有极少数30岁以上的城市男性属于自愿性晚婚。二是如果将九成的人已婚设为“大龄未婚”的下限年龄(即此后的择偶难度加大,未婚比例降低速度很慢),那么2010年女性在30岁、男性在35岁达到这一分界线;但考虑到农村的早婚习俗并兼顾两性的不同情况,我们统一将30岁作为“大龄未婚”的下限年龄。三是从我国人口普查数据看,人口在40岁以后未婚比例的降幅开始变得很小;但考虑到40-44岁年龄组人口仍会有一定的结婚机会,为不产生遗漏,我们将44岁设定为“大龄未婚”的上限年龄。

二、我国大龄未婚人口的群体特征

根据“六普”数据的粗略计算,2010年我国30-44岁的“大龄未婚”人口总量大约在1500余万人,相比于2000年推算所得的约900多万人和1990年的786万人^①明显增多。如果假设城市^②30-34岁男性未婚者绝大多数都属于自愿性的晚婚者,加上少量自愿晚婚的同龄女性,那么2010年全国非意愿的“大龄未婚”者至少也超过1300万人。

作为一个规模庞大的社会群体,我国“大龄未婚”人口表现出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男多女少,农村男女数量对比相差更为悬殊。2010年全国“大龄未婚”人口中,男性有约1100多万人,女性不到400万人,大体是3:1的性别对比关系。但在农村地区“大龄未婚”男女的数量对比大体为5:1;而在城市地区,“大男”“大女”的对比关系仅约为2:1。

第二,以30-34岁的低龄“大龄未婚”人口为主。2010年,30-34岁的未婚者在整个“大龄未婚”群体中的比重为51.9%,虽比10年前的56.2%有所降低,但仍是人数过半。因此全国的“大龄未婚”人口还是低龄者居多。根据目前年轻人口的结婚特点,这些低龄“大龄未婚”者中,城市有一部分是属于自愿性的推迟结婚者;而农村则主要是非意愿性未婚者。

第三,尽管“大龄未婚”人口规模可观,但占同龄人口的比重并不大。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个年份,30-44岁“大龄未婚”者占同龄人的比重虽有所上升,但也分别仅为3.4%、3.1%和4.9%。从这一点看,“大龄未婚”者在同龄人口中仍只是极少数且零星分布,我国整体还是属于“普婚”、“早婚”的国家。

第四,男性和女性“大龄未婚”人口占同龄人的比重差别明显。虽然未婚“大男”和“大女”随着年龄推移“脱单”的变化规律类似,但“大龄未婚”男性在所有年龄占同龄人的比重都远高于同龄女性。

三、大龄未婚人口的城乡分布特点

2010年全国城市的“大龄未婚”人群有560余万人,乡村有近780万人,其余210多万人生活在镇上,他们的占比分别为36.4%、49.7%和13.9%。如果不论婚否观察30-44岁人口的城乡构成,则城市、镇和乡村同龄人口的占比分别为33.3%、45.6%和21.1%。因此概略地说,相对更多的“大龄未婚”者聚集在城市和农村,居中的城镇地区“大龄未婚”者则相对较少。

^① 由于数据汇总的原因,2000年和2010年均是根据10%户抽样获得的长表数据推算所得,但1990年为100%数据汇总直接获得。

^② 本文的城乡人口划分均按照“六普”的统计口径,即根据国家统计局颁布的《统计上划分城乡的规定》(2008),使用的是常住人口统计口径。

(一)城市更多的是低龄大龄未婚者,农村则以中、高龄大龄未婚者为主

如果细致观察 35-44 岁的“大龄未婚者”,城乡情况有明显不同。农村基本属于择偶难的中(35-39 岁)、高龄(40-44 岁)“大龄未婚”者,他们在全部同龄“大龄未婚”者中的占比分别达到 53.6% 和 61.0%,远高于 30-34 岁低龄“大龄未婚”者 43.5% 的占比。同时,从城乡“大龄未婚”人口的内部构成看,城市的“大龄未婚”者主要是 30-34 岁的年轻人,而农村地区相对更多的是 35-44 岁的中、高龄“大龄未婚”者(见表 2)。

表 2		2010 年全国城乡的“大龄未婚”人口的内部构成						单位: %	
年龄组	城市		镇		乡村		合计		
	年龄构成	性别比	年龄构成	性别比	年龄构成	性别比	年龄构成	性别比	
30-34 岁	60.1	182.6	53.7	238.6	45.4	320.9	51.9	239.2	
35-39 岁	26.5	203.4	28.6	358.2	31.6	640.0	29.3	375.5	
40-44 岁	13.4	230.6	17.7	508.3	23.0	1091.7	18.8	561.8	
合计	100.0	193.7	100.0	299.7	100.0	488.7	100.0	311.4	

资料来源: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2,《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注:由长表数据获得。

(二)城市大女择偶难,农村大男剩余多

“大龄未婚”现象对于城乡的男性和女性有着不同的涵义。由表 2 的男女性别对比可见,虽然整体上“大龄未婚”群体是男多女少,但是城乡两性未婚人口的对比关系却十分不同。其中:城市的“大龄未婚”者尽管也是男多女少,但数量相差不多,男女基本是 2:1 的关系。对于“大男”来说,选择空间较大,他们可以选择年龄更小的女性,而“大女”在面临“大男”主要向下选择女方年龄时,尽管其人数相对少但择偶难度依然很大。农村则是男女数量相差悬殊,男性远多于女性,两者人数对比近 5:1;对于 35-39 岁和 40-44 岁的“大龄未婚”者,男女对比关系更高达约 6:1 和 11:1,农村待婚女性的稀缺使“大男”择偶极其困难。所以无论是“大龄未婚”问题的性质,还是择偶难的程度,城乡“大男”和“大女”面临的困难实际有很大不同。

(三)大龄男女总体数量基本平衡但未婚人口两性数量相差悬殊

表 3 给出了 2010 年我国城市和乡村地区 30-44 岁人口总的分年龄性别比及未婚人口性别比。从中我们发现两类地区有同也有异。

表 3		2010 年我国城乡 30-44 岁人口的分年龄性别比和未婚性别比							
年龄	人口性别比		未婚性别比		年龄	人口性别比		未婚性别比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30	99.8	101.9	177.2	248.1	38	104.1	101.4	211.9	737.3
31	100.0	104.9	182.3	299.1	39	104.7	102.3	210.5	829.6
32	100.1	103.4	182.2	338.2	40	104.5	100.4	218.1	886.3
33	101.3	104.9	188.4	393.7	41	104.2	100.4	235.0	1057.4
34	101.9	103.7	191.8	453.0	42	104.7	99.9	228.2	1133.1
35	101.7	103.5	198.4	521.6	43	105.0	99.7	245.5	1240.2
36	102.1	101.9	195.7	578.8	44	105.2	100.9	242.0	1361.8
37	103.7	102.8	205.5	651.3					

资料来源:同表 2。

城乡的相同之处在于:30-44岁人口的分年龄性别比和未婚人口性别比的关系特点十分一致,都属于人口总的分年龄性别比较正常、但未婚人口性别比远高于同龄人口总的性别比;与此同时,两类地区都表现为随着年龄的递增,未婚人口性别比持续升高的趋势。不同之处则是:城乡总的人口分年龄性别比表现不同,特别是农村地区中、高年龄男女数量非常平衡,城市则偏高。

实际两类地区最大的差异体现在“大龄未婚”者的分年龄性别比上。城市地区30-44岁人口的未婚性别比大致在150-250的范围内变化,整个升幅仅约36%;而农村地区的“大龄未婚”人口性别比则从30岁的248.1跃升到44岁的1361.8,升幅高达4倍多。这意味着在农村地区,40岁以后的“光棍”,10多人仅面对1位可相配的未婚女性,择偶的难度远大于城市同龄未婚男性。

(四)城市大男不少是晚婚,城市大女和农村大男主要是择偶难

图2和图3让我们看到了城乡在“大龄未婚”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另一种不同。从男性情况看,城乡“大龄未婚”者占同龄人的比重随年龄的变化趋势不同,未婚特点也不相同。首先,30、31岁的城乡男性均有很高的未婚比例,但对两类男性,可能未婚对他们的意义并不相同。在城市,30岁出头的男性未结婚很“正常”,只是一种待婚状态;而在农村,30岁出头已经属于找对象很困难的“光棍”了。其次,在32岁以后,城市男性的未婚比例迅速下降,最终真正未能结婚的人很少;但农村的同龄男性未婚比例降低的速度相对缓慢,与城市“大龄未婚”男性的差距逐渐拉大,最终未能结婚者的比例是城市的一倍。按照一般的理解,农村真正的意愿单身者应该明显少于城市男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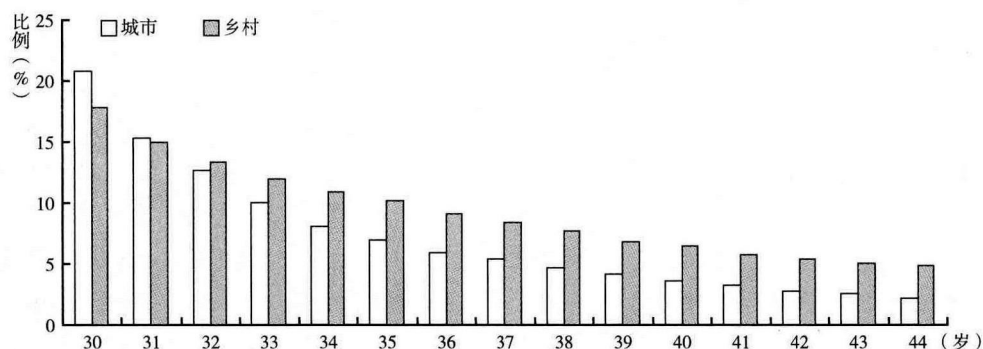


图2 2010年城乡男性“大龄未婚”者占同龄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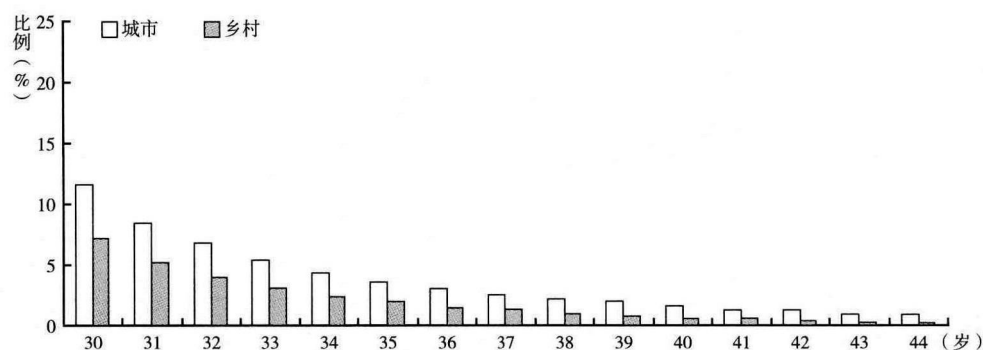


图3 2010年城乡女性“大龄未婚”者占同龄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同表2。

城乡“大龄未婚”女性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在30-44岁的所有年龄上,均是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占同龄人的比重高于农村的“大龄未婚”女性。在30岁时,城市“大龄未婚”女性占同龄人

比重还高达 11.7%，这时她们的农村同龄人的未婚比例是 7.3%。随着年龄的推移，城乡差距始终存在，尽管最终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的大龄女性绝大多数都找到了结婚对象，但整体看还是城市的“大龄未婚”女性被“剩下”的相对更多，当然这中间也不排除有自愿单身的女性。

从绝对数量看，2010 年 35－39 岁的“大龄未婚”者中，城市未婚男性有约 100 万人，乡村未婚男性超过 210 万人；城市未婚女性近 50 万人，乡村未婚女性仅 30 余万人。而同年在 40－44 岁的“大龄未婚”者中，城市男性、乡村男性、城市女性和乡村女性的未婚人数分别约为 53 万人、164 万人、23 万人和 15 万人。^① 我国“大龄未婚”者数量在城乡的“错位”现象由此可见一斑。

四、2000－2010 年的变化

(一)大龄未婚人口数量增多

如上述，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全国“大龄未婚”群体的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多，总量从不到 1000 万人扩增到超过 1500 万人。这中间除了两个年份 30－44 岁人口总的规模存在差异外（2000 年约为 2.88 亿人，2010 年增到近 3.2 亿人），最重要的仍是未婚人口所占比例的上升。

(二)两性数量不平衡趋缓

10 年间，我国“大龄未婚”人群的特点有较显著的变化。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大龄未婚”人口性别比在所有年龄都大幅度降低，即 2010 年的“大龄未婚”人口较之 2000 年，男女的数量差距明显缩小，性别比更趋平衡。

(三)占同龄人比重明显上升

“大龄未婚”人口无论男女，占同龄人的比重 10 年间都明显提高，尤其是女性。一方面，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趋向更晚结婚；另一方面，可能也裹挟着结婚难度的进一步增大，特别是对中、高年龄段的“大龄未婚”者来说（见表 4）。

表 4 2000 年和 2010 年“大龄未婚”人口占同龄人的比重及其变化 单位：%

年龄	男性		女性		年龄	男性		女性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2000	2010
30 岁	10.4	18.1	2.2	8.8	38 岁	3.7	5.8	.4	1.4
31 岁	8.3	14.2	1.6	6.3	39 岁	3.7	5.2	.4	1.2
32 岁	7.0	12.1	1.2	5.0	40 岁	3.8	4.9	.4	1.1
33 岁	6.0	10.2	.9	3.9	41 岁	3.7	4.4	.3	.8
34 岁	5.2	8.8	.7	3.0	42 岁	4.0	4.0	.3	.7
35 岁	4.8	8.0	.6	2.5	43 岁	3.8	3.8	.2	.6
36 岁	4.3	7.1	.5	2.1	44 岁	3.8	3.6	.2	.5
37 岁	3.9	6.4	.5	1.7					

资料来源：同表 1。

(四)绝大多数大龄未婚者最终迈入了婚姻殿堂

相比于 2000 年，2010 年低龄“大龄未婚”者相对有更多的人可能是出于晚婚的原因而暂时“大龄未婚”，男女均是如此。由此我们看到了两个年份“大龄未婚”男女占同龄人比重的变化殊途同

^① 由于“六普”的人口婚姻数据来自 10% 户抽样的长表数据，抽样比可能有一定差异，但应不影响本文的基本判断和结论，故不做更复杂、准确的推算。分城乡的“大龄未婚”人口数量只作为约数使用。

归,最终的终身未婚者比例 10 年间差别有限且都很低(见表 4)。只是在整个择偶和结婚的过程中,“大龄未婚”者 2010 年比 2000 年整体在延迟。对比男女两性的 10 年变化,城乡女性“大龄未婚”者占同龄人比重的差距更大,意味着城市女性“大龄未婚”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越来越突出;而男性在两个年份的变差似乎没有那么大。但无论怎样,最终终身未婚者的比例,男性基本不到 4%,女性更是不到 1%。

五、大龄未婚问题的本质是结构性失衡

由表 3 可见,我国 30-44 岁人口总的分年龄性别比基本正常,除个别年龄外,大体在 100-105 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适婚人口的男女数量整体平衡,不平衡的是这一年龄段的未婚人口。“大龄未婚”人口性别比不仅远高于同龄人口总的性别比,而且随着年龄的升高还在跨越式攀升。整体看,“大龄未婚”性别比是从 30-34 岁的 200-300,迅速上升到 35-39 岁的 300-400,并进一步攀升到 40-44 岁的 500-600,说明男多女少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这反映出“大龄未婚”问题的本质是两性的结构性不平衡。

(一)婚配性别比明显偏高

有学者采用依据平均初婚年龄差计算的男大女小的婚配性别比^①(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2002:56-63),以更接近现实的婚配模式。但我们据此计算的我国“大龄未婚”人口男女差 2 岁的婚配性别比依然是显著超过 100 的平衡点且随年龄的升高该指标值不断攀升。

(二)受教育素质女高男低现象明显

从表 5 可以发现:一是在所有年龄组,都是“大女”的整体受教育程度高于“大男”。集中表现在“大男”的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比例高,而“大女”则在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及以上明显占优,“大龄未婚”者教育素质“女高男低”的特点非常地突出。二是随着年龄增大,未婚“大男”的整体受教育素质急剧降低。到 40-44 岁年龄组,过半的“光棍”都是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能达到高中及以上的不到八分之一。女性最终“剩下”来的也多是低受教育程度者,但 30-34 岁的“大龄未婚”女性超过四分之一是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受教育程度的高学历者。人们所谓的“甲女”、“丁男”现象确实存在。

表 5		2010 年全国“大龄未婚”男女的受教育程度构成					单位:%
年龄组	性别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	大学本科及以上	
30-34 岁	男性	19.6	45.5	17.3	9.0	8.6	
	女性	12.5	40.0	20.5	13.8	13.2	
35-39 岁	男性	35.4	44.8	11.8	4.5	3.5	
	女性	19.3	41.1	19.4	11.2	9.0	
40-44 岁	男性	50.3	37.5	8.1	2.3	1.8	
	女性	27.5	38.2	18.3	8.9	7.1	

资料来源:同表 2。

(三)受教育程度越低,大男的剩余相对越多

图 4 给出的“大龄未婚”人口按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比显示,无论哪个年龄组,都是受教育程度越低,“大龄未婚”男女的数量相差越悬殊,男越多于女;而到了大专及以上高学历层次,在“大龄未

① 也称为相对性别比。

婚”群体中男女数量的相对差距最小,基本都是 1.5 个未婚男性对应着 1 个同龄未婚女性,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自身条件相对好的男性是否在同龄、同受教育层次的女性中寻找配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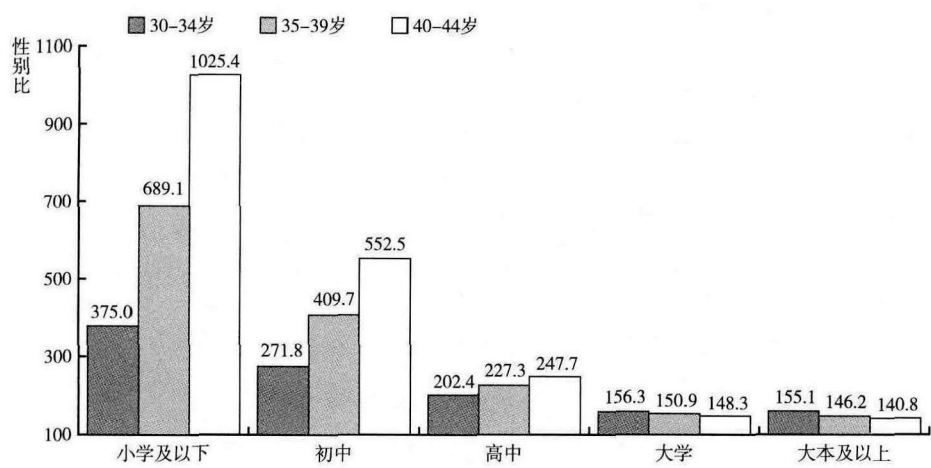


图 4 2010 年“大龄未婚”人口按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比

资料来源:同表 2。

(四)农村大龄未婚男性择偶更难

表 6 显示的是不同年龄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大龄未婚”男女的城乡差异。可以看出,在“大龄未婚”的各个年龄组、各种受教育程度,均是农村的男女数量差距更大,而且随着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升高,这种差距还在迅速扩大。尤其在 35 - 39 岁和 40 - 44 岁这样择偶已难上加难的农村地区“大龄未婚者”,可选择的未婚女性对比男性已极其稀缺;受教育程度越低、年龄越大的男性,可供他们选择的待嫁女性越稀少。其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么是寻找年龄差距很大的“老少”婚,要么娶外地、甚至外国媳妇。这也就间接地印证了为什么目前社会上越来越关注外来媳妇和外国媳妇带来的社会问题。

上述从多个侧面展开的分析都是为了说明和强调,无论是从人口学的角度,还是从社会学的立场来看,我国的“大龄未婚”问题本质上是结构性的性别失衡问题。源于此,要缓解或解决“大龄未婚”人口的婚配问题,依靠其自身,即群体内部完全“消化”难度极大。需要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通过更为多元化的婚姻选择形式才可能得到缓解。但不断增多的中、高龄“大龄未婚”者,尤其是农村个人和家庭条件均相对较差的“大龄未婚”男性,因择偶难而被迫选择年龄差距更大、地域跨越更远、风俗文化相异的“异质性”婚姻(包括跨国婚姻),也会带来一些新的社会问题。

表 6 2010 年城乡“大龄未婚”人口按受教育程度的性别比

受教育程度	30 - 34 岁		35 - 39 岁		40 - 44 岁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城市	乡村
小学及以下	267.1	402.0	330.3	801.5	377.0	1299.1
初中	230.3	305.8	256.3	566.9	282.0	920.7
高中	186.7	249.8	193.8	398.2	199.2	607.6
大专	146.5	206.4	139.2	281.3	137.6	307.7
大本及以上	148.9	229.7	140.7	247.9	134.9	397.9

资料来源:同表 2。

六、启示与思考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我国的“大龄未婚”问题及其人群进行了分析

与再思考。这种分析和思考主要是基于人口学两性对比关系的角度,同时也兼顾到对“大龄未婚”男女社会特征差异的考量。通过分析可以看到:“大龄未婚”人口在我国是一个规模庞大、数量十分可观的特殊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内部在男女、城乡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特点,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其中,农村中的低教育素质、高年龄的“大龄未婚”男性和城市中的高学历“大龄未婚”女性面临着择偶难的问题,值得给予特别关注。

当然,“大龄未婚”问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问题,其中既有人口学两性数量对比关系的影响,也有择偶条件、婚配模式和“婚姻梯度”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两类因素相互交织(叶文振、林擎国,1998)。正因为如此,婚姻市场中男女两性数量不平衡,必然会带来择偶难问题;但是即便男女两性的数量平衡,也不一定就没有择偶难的问题。从本文对“大龄未婚”人群的分析可以看到,在两性“大龄未婚”者数量相差明显、特别是城乡“大龄未婚”男女多寡不均的背后,本质上还是经济、社会特征带来的个人条件优劣不同的结构性失衡问题,这与一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也是一致的(崔小璐,2011;杨艳涛,2011;孟祥远、沈佳,2012;王磊,2012;伍海霞,2013)。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日趋多元化,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有了新的内涵,个人对生活目标的追求也更加丰富多样,这些都可能让今天的人口婚姻现象更加个性化和复杂化。从人口学角度,要积极推动人口性别比(包括处在起点上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平衡;从社会学的角度,则要为“大龄未婚”人口创造更宽松、包容、理解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尊重他们对自己生活的选择,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为非意愿性的“大龄未婚”男女创造择偶、结婚的机会,因为对于绝大多数“大龄未婚”者而言,这只是他们整个生命周期中一种暂时性的生存状态和阶段性特征。

参考文献:

- 陈友华、吕程,2011,《剩女: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学海》第2期。
- 陈友华、米勒·乌尔里希,2002,《中国婚姻挤压研究与前景展望》,《人口研究》第3期。
- 崔小璐,2011,《高知大龄未婚女性的婚恋问题浅析》,《西北人口》第5期。
- 姜全保、果臻、李树茁,2009,《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生命周期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刘爽、郭志刚,1999,《北京市大龄未婚问题的研究》,《人口与经济》第4期。
- 刘中一,2005,《大龄未婚男性与农村社会稳定——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后果预测性分析之一》,《青少年犯罪问题》第5期。
- 李咏华,1986,《我国人口的早婚、大龄未婚和终身不婚状况》,《人口与经济》第4期。
- 罗萍,1990,《我国大龄女性未婚现象浅析》,《民主与科学》第5期。
- 孟祥远、沈佳,2012,《“剩女”现象成因及其社会意义探究》,《湘潮(下半月)》第11期。
- 王昌逢,2010,《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剩女”现象分析》,《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第6期。
- 王磊,2012,《贫困地区农村大龄青年未婚失婚影响因素分析》,《当代青年研究》第12期。
- ,2013,《农村通婚圈变动对于男性婚配困难的影响——来自冀西北山区实地调查的初步发现》,《青年探索》第6期。
- 王跃生,2012,《大龄未婚、失婚男性的居住方式和养老状况——以冀西北农村调查为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第5期。
- 伍海霞,2013,《农村男性大龄未婚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河北CC县调查的发现》,《人口与发展》第3期。
- 靳小怡、谢娅婷、郭秋菊、李艳,2012,《“光棍”聚集与社区公共安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 杨艳涛,2011,《对我国社会“剩女”现状的思考》,《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第3期。
- 叶文振、林擎国,1998,《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 张萍,1989,《中国大龄未婚问题及特点》,《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 左雪松,2012,《婚恋情境中的“剩女”浮沉:历史、理论与现实》,《当代青年研究》第4期。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协同创新中心(刘爽)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蔡圣聆)

责任编辑:石金群

(positive emotion/neutral emotion/negative emotion).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sults, we have found that college students have some kind of competence in lie detection, the percentage of accuracy in lie detection is higher than truth detection; lie fragments including emotional cues are more easy to be detected, especially in positive emotional cue, the percentage of accuracy in detection is the highest; for males, there is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ompetence in recognition of micro-expression and percentage of accuracy in lie deception; METT could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subjects' competence in recognition of micro-expression, this improvement could facilitate males' judgment in lie detection more than females.

Keywords: Micro-expression Lie Detection Positive Emotional Cue Negative Emotional Cue Neutral Emotional Cue

Reconstructing the Contract between State and Young Families: Collective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 Rearing Ma Chunhua(66)

Abstract: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economic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hildren have become (quasi) public goods and social investment goods from traditional private goods; meanwhile, the benefits brought by children have changed from owning exclusively by their families to sharing by whole society. But while the benefits from children are socialized, the cost of child rearing is still private. This kind of dislocation has brought about many negative consequences including low fertility; this situation has forced every country to gradually form the consensus in state's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ren rearing, and implement this consensus in concrete social policy.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China takes fewer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 rearing besides compulsory education. In order to decrease its negative impact on young women's employment, reduce the burden of young parents and maintain substantialit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hina should reconstruct the contract between state and young parents and share responsibility for child rearing by the whole society.

Keywords: Cost of Child Rearing (Quasi)Public Goods Social Investment Goods

Who have been 'Left'? Liu Shuang & Cai Shenghan(76)

Abstract: Using census data, this paper has the following findings: although the scale of 'unmarried elders' is large in our country, the percentage in age cohort is very low; there are more males than females within the group with more disparity in rural areas; the majority of 'unmarried elders' in rural areas are older than those in urban areas ;regarding marriage selection of 'unmarried elders', 'elder females' are difficult to find their spouses in urban areas, while there are more left 'elder males' in rural areas. Regarding the essence of 'unmarried elders' issue, it is not due to imbalance in ratio of age and sex in general population, but rather caused by structural imbalance in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means outstanding females and disadvantaged males are more likely to become 'unmarried elders'. In recent years, with increase in scale of 'unmarried elders' and rise of its percentage in age cohort, gender imbalance in quantity has slowed down. For most 'unmarried elders', this is just an temporary living condition in their whole life course, most of them will enter marriage eventually. The males who never marry all their life are less than 4% , the females are less than 1% .

Keywords: Unmarried Elders Marriage Squeeze Urban-rural Difference

The Study on Condi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Urban Labor Relations and Sense of Justice Li Sheng(85)

Abstract: Based on survey data towards migrant workers in Beij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condi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urban labor relations on their sense of justice. According to research, we hav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it's not easy for young new gener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to form sense of social justice; relative low labor rewar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justice; perfection of labor security is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justice ; relative large labor intensity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forma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sense of justice. According to research results, we could infer that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urban labor relations might become an important breakthrough in promoting migrant workers' positive social mentality.

Keywords: Employed Migrant Workers Labor Relations Sense of Justice